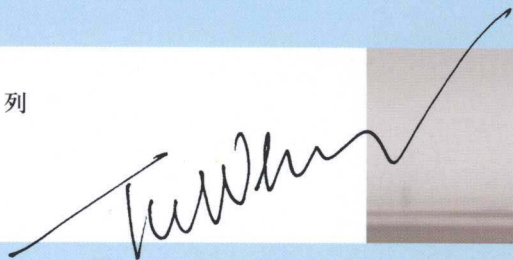


杜维明著作系列



龙鹰之旅

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

杜维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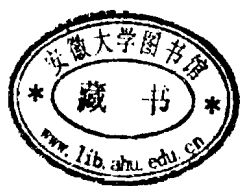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龙鹰之旅

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

杜维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杜维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杜维明著作系列)

ISBN 978-7-301-22007-8

I. ①龙… II. ①杜… III. ①新儒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6521号

书 名: 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

著作责任者: 杜维明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007-8/B·110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0577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1230mm A5 7.875印张 插页2 150千字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1954 年,杜维明 14 岁,随童子军在阿里山露营。



1957 年,高中毕业照。(前排右一为杜维明)



1963 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毕业时。

献给我的启蒙恩师周文杰

再版序

1968年是20世纪知识界的关键年。巴黎街头的五月风暴虽然基本和平,但法国的政治文化却因此而有了本质的变化。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人(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职业人士、自由作家和大学生)从未有如此投入国事和天下事的。不止法兰西,德国和意大利亦复如此。美国则从1964年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开始,大学生抗议政府反民主行为的集会更是屡见不鲜了。欧美思想界的大气候对我在60年代的发议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1962年我从只有六百名本科生的东海大学到美国动则万人以上的高等学府求学时。我最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大学生对国事和天下事,事事都不关心的校园生活。除了埋头读书外,引起“群众”兴趣的多半是球赛,否则就是各种青年人的娱乐和胡闹。不过,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很快就改变了一切。1966年我从康桥绕道欧洲飞返台湾时,四年的哈佛经验就不只局限在象牙塔中了。

根据社会调研,60年代全球大学生政治觉醒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口膨胀,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史中首次出现了“青年”的群体,他们不只是从少年到壮年的过渡,而是具有独特风格和长远意义的年龄带。不过在文化心理的视域中,这一现象和当时影响人类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有必然的关系。

回想我1962年到哈佛留学,整整四年(包括寒暑假)都在美国的剑桥学习,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为谋生活或娱乐而不学习的。一千四百六十天,在人生旅途中不算长,但这是我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义理专业到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博士候选的转型,触动了我身心灵神中每一个部位,调动了我每一个细胞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转型使我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而进入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值得强调的是,宽广的时空视野,并没有迫使我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正好相反,我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提高了。我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

1966年通过博士口试后,我获得了研究院“哈佛旅游学者”(Harvard Traveling Fellow)的奖学金。我虽然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金资助留学美国的,但我攻读博士四年的大半费用却来自条件更优厚的研究院。1966年夏天我选择了绕道欧洲回归台湾

并访问香港、汉城和京都的路线。我仔细参观了伦敦、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柏林的汉学中心,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回到母校(台湾东海大学)我在通才教育的计划中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一门专门探索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复兴的课,选修的13位同学中至少三位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的道路。我还指导了高承恕以“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历史分析”为主题的学士论文。

回到台湾的那几个月,秋季在台北,春季在台中。在台北期间我在台湾大学作了两场报告,参加了为《知识分子》撰写专论的工作,和殷海光定了忘年交,结识了陈鼓应和李敖,担任哈耶克的翻译,和这位20世纪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朝夕与共十来天。我还到汉城拜访了高丽大学的李相殷,到香港在业师牟宗三家问学一个多月,然后把他刚完成的《心体与性体》三册书稿亲自带到台北交给正中书局,也和唐君毅一同游览京都、天理和奈良。1967—1971年我任教普林斯顿。那时正值台湾旅美学人因受美国大学生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抗争和华裔族群意识高涨的激励,抗议精神在校园勃然兴起。钓鱼台运动在普林斯顿开始是偶然也是机缘。当时,五位从台湾和香港到普大攻读物理学博士的青年,要求我为他们组织“习明纳”(seminar)讨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

族的命运。关注的重心是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剧烈的氛围里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的文化认同问题。其中一位是胡朴凯。如果不是他父亲胡秋原那时访问美国提醒大家正视当下关系民族尊严的重大问题：“因为国民政府软弱，钓鱼台主权被日本侵占”，从台湾到美国大半专修理工科对文化历史所知甚少的留学生听说钓鱼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不是因为我安排让普林斯顿习明纳的同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地区关注国事的“公共知识人”像学术界的唐德刚和媒体界的郑心元联系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习型组织，交流信息、观点和思想，胡秋原提供的消息即使激起强烈的义愤，也不可能导致任何有政治意义的集体行为。经由普大同学发起，通过纽约的联网，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就在大纽约地区动员了上千名同学、侨胞和国际友人在联合国大楼前举行抗议。如果抗议行为没有获得任何反应和认可，最多也就像无数在纽约街头乌合之众的游行示威一般，过去就过去了。我想 CBS Walter Cronkite 的重点报道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确是一大助缘，不过使得钓鱼台事件成为钓鱼岛运动的基本原因是台湾留学生和华裔青年的政治自觉。当威斯康辛大学，特别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文科同学积极投入时，我有预感这将成为有“历史意义”（historical significance）的“爱国运动”了。

我认同儒学甚早，没有考进大学就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但

我能坚持人文的学术方向固然是发自内心的愿力和师友的提携,可是“政治觉悟”至为关键。1954年我因全省童军会考名列前茅获得代表“中华民国”到马尼拉参加世界童军大会的殊荣。华侨的热爱加强了我以为“我们”是象征中国文化未来的傲慢。台湾的民族精神教育使我不自觉地就暴露出“我们”(宝岛的炎黄子孙)才真是儒家传人的气焰。可是当我发现两位来自香港的女童军能背诵好几篇《古文观止》收入的精品,对大陆有同情的了解,而且待人接物都比我文明礼貌,我开始怀疑我的霸道也许只是“气魄承担”,并没有什么文化价值的内涵。后来我仔细观察国民党强势道德说教背后的意识形态,发现我所理解的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和教室里宣传的孔孟之道大异其趣。国民党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政权而设计的“民族精神教育”,掺杂了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效果当然极差。不过,我的确是这一设计的受益者。我的启蒙恩师周文杰就是常受同学屈辱的讲授“民族精神教育”的老师。如果不是他在班上挑选了五位同学和他定期地经常地没有利益目的地“体知”四书,我肯定不会走进儒家的堂奥。

在东海大学我摸索出一条读古人书想见其人可以加强现代精神、和美国友人对话可以加深中国情怀的为学和做人的道路。哈佛经验帮助我彻底消解了古今中西的二分法,稳步走向多元并进和综合创新的思路。理念清晰,逻辑谨严是我决心紧紧把握的基

本功，但我坚信必须超越线形思维和因果推理，勇敢地认知因内容丰富而不免模糊的文化现象才能在人文学领域（文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深度心理学、政治文化学、宗教学、经济发展学、知识社会学等）中有所建树。读萨特的存在主义使我振奋，但我更投入别嘉耶夫和齐克果的神学。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尼采的“解构主义”（特别是“上帝死亡”之类的极端论说）和晚期海德格尔的哲学反思对我更有启发。我在大三翻译了艾略特（T. S. 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详读了托尔斯泰的英译《战争与和平》，也积极参加了“查经班”。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体悟了神圣的庄严，从希腊神话（《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看见了多元多样的灵性和肉欲的交战，从19世纪的英诗中感受到语音之美，从《法华经》中洞悉了大千世界不过如此。印象最深的学习或灵修经验也需要算一位雷神父单独为我定期讲解天主教基本教义长达两个学期。他是耶稣会教士，深受“解放神学”的启发，对“儒耶对话”有浓厚的兴趣，他那以“仁心说”的长者之风对我解经没有任何传教的意味，我则以“学心听”的态度同情地去理解他的教诲。这也许是我决定在毕业戒指上镌刻“FB”表示愿意细读四书和《圣经》（*Four Books and the Bible*）的背景理由。

1966年回到台北不久，经韦政通的介绍认识了殷海光。他体

现了徐复观所谓“自由主义儒家”的风骨。和他订交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是一位真能爱也真能恨的知识分子,没有一点乡愿气。哈佛燕京社曾请他在康桥访问一年。据说他深居简出和哈佛教授接触不多。他心仪哈耶克,很想和第二次访问台湾的古典经济大师再度见面。当时我是哈耶克的翻译,几乎朝夕与共。可惜我无法安排他们晤谈的机会。哈耶克夫妇以能亲晤蒋介石为平生大幸,我很不以为然。我的批判精神,特别是政治自觉的批判意识是逐渐形成的。小时候我很喜欢一个人玩的游戏是“蒋委员长”。把自己珍贵的玩具按照不同的规则加以排列组合;有时一线展开,有时多线并列,有时形成各种图案。想象自己是大将军、总司令、元帅,乃至设计师、创造者。蒋中正是“民族救星”,是“完人。”在初中我还从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来论证蒋先生的伟大。读了《大学》和《中庸》,对理想人格有些许了解,政客军人对我的吸引力便荡然无存。从哈佛归来,对中国当代史略有所窥而且已亲炙不少学者、思想家、神学家和哲学家,蒋公的形象在我心中已黯淡无光。因此我拒绝陪同哈耶克夫妇拜见蒋总统,只在会客室等候。一个多小时由钱复带领他们出来,我对他们的欣喜感到很不自在。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的一般印象是,哈耶克是自由主义大师。但我所了解的也相当认同的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传统则多半把以市场经济为研究核心的“芝加哥学派”当作保守主义。以哈佛的

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比如,他们指出,没有联邦政府的积极参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在南方必然夭折;没有联储局的介入,金融风暴绝不会自然平息。哈耶克和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不同,有强烈的反民主的贵族心态和情绪。当然也有所谓“精神贵族”的因素在内。作为奥匈帝国的臣民,他有敬重权威的心结,也对传统有深刻的体会。他的学术谱系中有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也有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是位敌友分明的反共公斗士。殷海光对他的《到奴隶之路》推崇备至。他引卡尔·波普(Karl Popper)为知己,却严肃地对我说罗素的头脑既简单又糊涂。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原名是《三年的畜艾》。这本来是其中一篇为纪念殷海光而草就的八段即兴随笔。另外,我决定把陈张素珍有感而发的两篇狠批我的文章收入,因为它们反映了不少读者对我悉心营造的观点的“误读”。同时,我也决定收入了梅广的回应。我要感谢景海峰同意把他的短评收进附录,也要感谢好友陈平景愿意分享他所亲睹的殷海光和我的情谊。

序

我是1962年来美国的,8月中旬从台湾中央山脉的游击训练调返嘉义退伍,9月下旬就在大西洋岸边的康桥过起研究院学生的生涯。天气、土地、风俗人情的转变都太突然了。置身于英文的环境,又加上勤修日文和补习法文的压力,常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文化疏离。只有在深夜或清晨用方块汉字来传达心声的时候,才觉得真正地亲近了自己的根源。记得在大学时代,为了锻炼英文,逐渐地养成了运用英语思考的能力;出国以后,我又自然地恢复了运用国语思考的习惯——一种内心的“对话”。有时还“挤出”一些时间写散文,间或也向台湾的报章杂志投稿。

1966年回台湾一趟以后,想用中文撰稿的要求更强烈了;加上心里本来藏着许多积郁经年的问题,又再受到各种新思想的敲打,有时竟耐不住阵阵怒潮的撞击。在万分忙碌中痛下决心,通宵达旦地写,多半停笔后即撕去;间或也有稿成,朗诵几遍,投递发表

的。如果没有那些极不正常的“自我迫压”，现在我也许不会轻易动笔。不过，我真应该沉住气，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再发表成熟的学术论文，在现阶段就把一些切身的感受传达出来，真是大逆不道吗？

如果不是林衡哲先生一再的督促和帮忙，我绝不会有把后面这几篇文字搜集发表的意念。因为文字是思想的表征，而这几篇文字所表征的思想还是太贫瘠、太散乱了。当然，路是人走出来的，怕摔跤的人永远不能履行“任重道远”的古训。

不过我应当指出，真正促使我出版这个集子的动力，却是我自己内心深处对一位时代见证者的怀念。我和这位业已作古的先生虽然只有淡如水的六面交谊，但是我们之间确有一种隽永的默契。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海德格尔说，诗人是呈现真实的灵魂），相较之下我反而变成了冷血的理智动物。他对我的关切在文字和行动上都表露无余，我反而显得太“淡如水”了。我总觉得我应该和他再谈几次，可惜现在已经太晚了！不，仅从和他一个人谈话的立场而言也许确是太晚了，但是从知识分子全体之间相互的对话而言，现在正是晨光熹微中处处闻啼鸟的时辰呢！

目 录

再版序	(1)
序	(1)
知识分子与时代信息	(1)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	(8)
在学术文化上建立自我	(16)
争取国际学坛的发言权	(21)
从建立自我到国际学坛	
——一些杂感似的答复	(27)
消弭学术界的趋时风气	
——介绍熊十力先生的《戒诸生》	(40)
从博士到教授	
——漫谈美国的学术界	(44)
美国学术“市场”概况	(49)